

問路

一九六一年
全党农村大调查

罗平汉◎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问路

一九六一年
全党农村大调查

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ISBN 978-7-5073-2841-7



定价：30.00元

问 路

——1961 年全党农村大调查

罗平汉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路——1961年全党农村大调查 / 罗平汉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73-2841-7

I. 问… II. 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61~1962

②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料 IV. 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819 号

问路——1961年全党农村大调查

著 者/罗平汉

责任编辑/刘庆旻

责任校对/景 影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010)66513569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mm 16 开 16.25 印张 220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5073-2841-7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大跃进”欲速则不达

- 1、超英赶美,以钢为纲 1
- 2、“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12
- 3、初步调查与初步纠“左” 21

二、“反右倾”反出严重困难

- 1、纠“左”变反右 30
- 2、“五风”挫伤农民积极性 40
- 3、实无优越性的“大锅饭” 46
- 4、竭泽而渔的高征购 51
- 5、难以想像的严重困难 57

三、毛泽东号召调查研究

- 1、紧急指示信十二条 63
- 2、未解决问题的整风整社 74
- 3、“要搞调查研究” 82
- 4、中央调查组(一) 87
- 5、中央调查组(二) 92

四、农业六十条草案

- 1、“搞这个条例有必要” 99
- 2、起草农业六十条 108
- 3、“要下决心搞调查” 118
- 4、对公社体制的初步突破 125

5、“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	133
---------------------	-----

五、听到真话不容易

1、养猪场暂作主席府	142
2、“从前政策上有问题”	147
3、听到真话不容易	154
4、“不是天灾,是人祸”	161

六、问计普通百姓间

1、周恩来邯郸之行(一)	170
2、周恩来邯郸之行(二)	176
3、邓小平、彭真京郊调查	181
4、朱德、邓子恢力陈食堂弊端	188
5、陈云青浦农村调查	194

七、全党农村大调查

1、“食堂问题多,在家吃饭好”	202
2、“供给制养懒人,养坏人”	212
3、“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	218
4、“六十条”的重大修改	223

八、为下放核算单位再调查

1、“三包一奖”解决不了平均主义	229
2、毛泽东肯定分配大包干	235
3、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246

主要参考文献	254
--------------	-----

一、“大跃进”欲速则不达

1、超英赶美，以钢为纲

说起 1961 年的全党农村大调查，就不能不提到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所谓大跃进，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各项事业实现超常规的发展。跃进一词，辞典上有两个解释，一是跳着前进，二是比喻极快的前进。跃进本身就有快速发展的意思，而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大”字，可见“大跃进”其实就是高速度的同义语，而且这个高速度是超乎寻常的。所以 1958 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超速度，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进入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率先于各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发生在 1958 年，但这两件事都不是突如其来，毫无源头的。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超高速度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所表现了，最明显的是 1956 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

1955 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之间，曾有不同看法。邓子恢主张 1955 年发展到 100 万个合作社，毛泽东主张发展到 130 万个合作社，也就是在 1954 年 65 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这年 6 月下旬的一天，为了这两个数字，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争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毛泽东认

为邓子恢在发展合作社问题上缩手缩脚，存在比较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

其实，1955年适当地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毛泽东原本也是同意的。而且这100万个合作社的数字，还得到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那么，毛泽东为何不久又认为合作社应当大发展呢？这年初提出控制合作社发展数量，主要原因在于粮食统购统销致使农村形势紧张，加上1954年合作社发展快了一点，管理工作跟不上，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粮闹社事件。毛泽东本人也说过，这是生产力暴动的表现，他还提出合作社应当采取停、缩、发的方针，也就是发展太快的地方应停止发展，数量过多的地方应通过整顿压缩数量，至于那些过去合作化速度较慢的地方则仍可适当发展。

可是，这年5月，毛泽东到南方去视察，发现沿途庄稼长势很好，农民正在积极生产。在此前后，有地方向中共中央和他报告说，经过整顿统购统销，粮食销量大幅度下降，所谓缺粮，主要是少数富裕中农的叫喊声。这样一来，使毛泽东认为原来下面汇报的情况有误，中央农村工作部说农村形势紧张，是夸大其词，粮食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合作社还是可以大发展的。所以从南方回来之后，他就找邓子恢谈话。当邓子恢坚持合作社仍按原定的100万个发展时，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及其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如同“小脚女人”走路，不但自己走不快，还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于是，他亲自发动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

这一批判，就使得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并由此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际上只花了三年就完成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又使毛泽东感到，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加快。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不须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少慢差费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初起,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作了压缩,在实践中形成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表现出过不高兴。1956年4月下旬,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这一年的基本建设预算,结果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会上尤其以周恩来发言最多,强调追加预算的各种害处。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泽东,说自己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他就离开北京去了外地。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宣部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社论草稿在经刘少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说,那是骂我的,为什么要看?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何况党内领导层中多数人主张反冒进;二是不久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波匈事件的处理上。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又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这一整风,没想到整出了一个反右派运动。所以反冒进提出一年多来,毛泽东对此虽有保留,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波匈事件虽然平息了,反右派运动也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但这两件事却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达,物质基础不牢固。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原本也是对的,但问题出在用什么方式发展经济上。这时,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赶超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仍是低速度，慢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就会很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

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于是，毛泽东将反冒进与所谓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为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提供了借口。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将他这种想法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按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①

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而这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发展也比较好，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本来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并公开表露出对此前进行的反冒进的不满情绪。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作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谓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业发展纲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12年以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以北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因为纲要共四十条,故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①从此之后,毛泽东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公开批评。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不但进一步使毛泽东感到反冒进是错误的,搞建设就是不能有右倾保守思想,就是要实现高速度,而且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可能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这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很高。11月6日,毛泽东出席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了一天,上午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下午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或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话的。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主席出席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②

这一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兴致很高。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实际成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角。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一再讲,要以苏联为首,说有那么多的党,总要有个为首的。他说:“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②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当然，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讲过这样的话，这仅是笔者的分析。

中国领导人当然清楚，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大的发言权，实力还不够，还必须在短期内把经济搞上去。当时，人们是把钢铁产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指标。所以，能否赶超英美，关键是看钢铁产量能否上去。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将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对此既感到鼓舞，又感到压力，认为中国也应急起直追，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乃表示：苏联十五年后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中国将用十五年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

当然，毛泽东这个表态，也并非没有根据。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的谈话中了解到，十五年后，英国的钢产量可能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中国这时的钢年产量约500余万吨，按每五年翻一番计算，再过十五年可达到4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十五年赶上或英国是可能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十五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1958年喊得十分响亮的“超英赶美”口号由此而来。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这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在超英赶美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很大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多，人多力量大；二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搞革命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二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时间表，在“大跃进”发动后又一再被缩短。

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送来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其中提出，到1962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并且认为只要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再有十年也完全可能赶上美国。受其影响，毛泽东在4月2日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便提出要“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将其修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这样，原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时间缩短到只有七年，赶超美国的时间也变为十五年或十七年。

同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为此，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为了使1959年钢产量超过英国，就必须使1958年钢产量至少达到1000万吨。由于1957年全国钢产量为535万吨，最后内部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100万吨，对外宣布是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从那时起，笔者所在的中央党校通讯处就叫北京1070信箱。

自从“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来后，毛泽东认为，目前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还没有克服，仍存在少慢差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又是受了此前反冒进的影响。于是，他多次对反冒进作了严厉的批评，并且批评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

195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来到了广西南宁，在这里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

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他又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 50 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还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 1958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致使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反而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由农业领域发展到各个方面。

1958 年 2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 月和 4 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5 月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 2 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

在 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由于把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试想还有谁敢坚持反冒进?而此前毛泽东曾提出,要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不给反对者提供口实。并且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要将博士学位授予发明这一词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在 4 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 1957 年比 1956 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

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也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报告说：“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①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只得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并在不同的会议上一再作检讨。

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也是“大跃进”从发动到高潮的过程。进入6月之后，“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各种好消息也不断地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大队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同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宣布，该社第一大队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亩产3530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自此之后，各种“卫星”争相竞放，并且产量越放越大。

6月16日，负责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认为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用不了三年时间即可赶上和超过英国，原来需要十五年才能实现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

几天后，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又告诉毛泽东：华东四省一市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500亿斤，人均达到了1000斤，原来计划四五年时间才能实现的指标一年就达到了，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在5000亿斤以上。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1958年7月23日,国家农业部发表公报宣布:“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①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用“大跃进”时特有的语言表示:“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②

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很快就能赶上并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一个问题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中国在不长的时间超过英美之后,下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要不要从现在起就考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8月,在全国一片“大跃进”的炽热中,中共中央在凉爽宜人的北戴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那年月,人们是将钢产量的多少,同工业化水平的高低等同起来的。自从制定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之后,钢产量是否能超过英国,就成为短期赶超的最主要内容。1958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全年的钢铁生产将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但直到北戴河会议召开时,还只完成了450万吨。也就是说,在剩下的4个月时间里,却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这显然是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进行生产所无法完成的。

既然正规钢铁企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就想起了老办法——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因此,北戴河会议不但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全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而且明确提出要来一个

① 《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标志》,《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② 《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北戴河会议后,各地大搞“小(小转炉、小土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兴建了难以数计的小土高炉。炼钢铁需要铁矿、煤等原料,也需要交通运输,于是在地质、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大搞“小、土、群”,出现了全民找矿、全民办小煤窑、全民办交通运输等一系列的“大办”。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则更是增加到9000多万人。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四个月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要在今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号召,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现在已经胜利地提前、超额完成了。”^①

1070万吨钢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首先,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高等学校的校园里、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里,甚至党中央、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尤其严重的是,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在秋收大忙季节,丢下已经成熟的农作物不管,参与炼钢炼铁,大量的粮食未能及时收回而烂在地里。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当年约有10%的粮食在地里没有收回。1958年的确风调雨顺,庄稼长势不错,本是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年景,但是,丰产并不丰收,成为1959年粮食紧张的重要根源。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其次,全民大炼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1958年生产的1073万吨钢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他的是根本不能用的钢坨坨铁圪塔,而国家却为这些土钢土铁付出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生铁的成本

① 《一年之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2日。